

鹤山坪的那张书桌

史良高

那是一张长不足一米、宽不足二尺的两屉桌，旁边是一张同样陈旧的老式雕花木床。桌前，立着一把木椅。书桌、木椅都已被岁月的风霜打磨得破旧，粗陋，灰不溜秋。

它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鹤山坪石墙院里，曾伴随陈独秀先生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。

1937年8月，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。1938年7月，与妻子潘兰珍来到重庆，8月前往江津。身无分文的他难以安身，只得携妻投奔江津好友、安庆同乡邓仲纯。兵荒马乱，赤日炎炎，两家老小挤在一起，苦不堪言。一个偶然机会，陈独秀在旧书摊看到一本《皇清经解》手稿，原来是光绪年间的特科贡士杨鲁丞的遗著。他当即买了。杨家后人住在鹤山坪，还存有祖上几箱遗稿，正想寻找一位文化人代为校正并作序，听说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对祖上的遗文感兴趣，找上门来，竭诚相邀。

1939年5月，陈独秀来到鹤山坪石墙院，为老杨家整理家谱和杨鲁丞散佚的书稿。这一份工，让他谋得免除租金的栖身之地。

在石墙院，陈先生白天像一只蠹虫钻在霉气熏天的故纸堆里，寻寻觅觅，圈圈点点，修谱，校文，写序。夜阑人静，他才能坐到昏暗的油灯下，展纸磨墨，耕耘自己的那片自留地。他在著述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这部语言学专著起稿于南京老虎桥监狱，初名《识字初阶》，抛开《说文解字》框架，旁征博引近代出土的甲骨文、金文、古玺、货币、陶瓦残片等古文字，让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和市井方言隔空对话，以探求文字之本义，匡正前人文字谬误。

1941年8月，因下山去30多里外的江津求医问药，装有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书稿下篇的箱子被偷，虽后来追回，但书稿已被小偷烧毁三分之一。先生只得趴到这张书桌，凭借记忆重写失稿。书稿终于到了国立编译馆编辑梁实秋手上，正欲付梓，教育部长陈立夫却执意改名《中国文字基本形义》，先生坚持“一字不能动”。出版一事，最终搁浅。1995年，巴蜀书社正式出版了这部著作，陈先生已在九泉之下长眠五十余年。

就在那间光线晦暗的卧室，胡宗南、戴笠受蒋介石之托，拎着礼品，看望病榻上的陈独秀，请他发表“高论”，邀他出山，遭到当场拒绝。在这张书桌上，先生曾给诸多友人写信。有一封是写给好友汪孟邹的，让他致信美国的胡适：“我生活要求简单，也不愿去异国他乡，更厌烦见生人，所以，我还是不去美国好。”时任驻美国大使胡适邀请陈先生去美国撰写自传，遭到拒绝。还有写给台静农、章士钊、何之瑜等人的信，后钧收入《陈独秀书信集》。有致“精神后学”杨鹏升的信40封，内容涉及生活

困顿、学术探讨（如文字学）、请求墨宝印章、感谢资助等。

1942年4月5日，陈独秀逝世前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写给杨鹏升：

鹏升先生左右：

3月12日两示均敬悉，承赐信纸二百、信封一百，谢谢您！吾兄经济艰难，竟为弟谋念，且感且愧！弟子印章过于外行，然累奉命，不能坚辞，间集成时，拟勉强数语以塞责也。前次移黔之计，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海拔较高，于贱恙不宜，非生活所迫。与吾公素无一面之缘，前两承厚赐，于心已感不安，今又寄千元，且出于吾兄之请求，更觉惭恧无状，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。前敬题大联，恐未曾寄到，来函云收到者，殆为造此言以慰我耳，倘真收到，请示以弟所题语句，则始能相信也，如何！

此祝

健康

弟 独秀 启
四月五日

先生晚年，几乎全是仰靠北大同学会和朋友的一点资助。他与妻子挑水浇园，种菜蔬果腹。为了节省生活开支，曾想迁居贵州。尽管这样，来自蒋介石等政要拉拢的钱他一分不收，素无知交者的钱他一分不收，就连《小学识字教本》预支稿费10000元法币也悉数退还。有朋友资助，他要拿出一两幅自己的“墨宝”用以回报。

在这张书桌上，他写过一首《致欧阳竟无诗柬》的自嘲诗：“贯休入蜀唯瓶钵，卧病山居生事微。岁尾家家足豚鸭，老饕独羡武荣碑。”1941年腊月，山村人家都纷纷忙着宰猪杀鸭过年，而陈先生只能怀抱一本从佛学大师处借来的《武荣碑》“解馋”。

除了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陈先生还有一部尚未完成的《实庵自传》。自传和识字教本一样，都起草于南京监狱，只是战火纷飞，居无定所，他的自传才交付两章，杂志社催稿不断，他想在石墙院完成后续工程，至少写到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只因病魔缠身，日无暇晷，迟迟未能动笔。后来他不得不把手稿赠给“忘年师友”台静农。入川以后，台静农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出版一事，山上山下往返奔波，还帮先生在白沙、江津四处租房。三年间，两人仅书信往来就达百余封。先生身无分文，家无长物，唯赠手稿以表谢忱。

《实庵自传》没有写完，非独秀先生一生之憾事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损失。在那间斗室，在那张破旧的木桌上，独秀先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“九州事，情难绝，千秋业，肠仍热……”他开始反思，反思历史的经验与教训。就在离世前几天，他还抱病写下《被压迫民族之前途》，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枚正义的感叹号。

陈先生被囚禁于南京的时候，刘海粟前往探监，先生曾赠其一幅书法作品：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。”如今，这副对联悬于重庆江津石墙院陈独秀卧房。那，正是先生一生铁骨铮铮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写照。



远山
刘谢农 摄

老街知道

李佳静

黛瓦知道。粉墙知道。那一列列马头墙翘首向天，像躲在云里的诗行，等谁来读。

午后三点，阳光斜斜地筛下来，落地时碎了满街的金箔，薄得透明，踩上去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走在南京老门东的青石板上，人声薄薄的，像宣纸上洇开的墨痕。不是假日，游人零落，唯有一些乌鸦不时从屋檐上掠起，翅膀划破空气的声音，像剪刀裁开一匹旧绸。

老街上那些徽派建筑的气韵，总是一样的，却又总是不一样的。粉墙剥落出时间的肌理，黛瓦叠成一行行平平仄仄的韵脚，而马头墙高高低低地站着，像永远不会下台的旧戏子，在蓝天的布景前，水袖收拢了，唱腔哑了，却还坚持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姿势，唱着无词的徽腔。

我也曾去过杭州清河坊街。清河坊不一样。它更闹，更艳，像一幅设色浓重的工笔画，每一笔都涂得满满的。街两边的建筑也是徽派的基调，但被时光添上了南宋的胭脂、民国的口红，层层叠叠地敷上去。芜湖的老街不似南京的文气，也不似杭州的繁华，它更质朴低调，也更安静。但仍有湛蓝的天，气派的马头墙，有芜湖烤鸭和六安瓜片抚慰味蕾，有瑞幸和辛巴克咖啡在做中西对话。

除了徽派建筑，让我驻足停留的，是老街的窗。那些窗——漏窗、花窗、空窗、什锦窗，像一双双会说话的眼，安安静静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。漏窗是羞涩的，漏进来的光是碎的，漏进来的时间也是碎的，像打翻了一地的珍珠。花窗是高调的，那些花草、树木、鸟兽都是会勾人心魂的，每一刀都是匠人用心刻的，深浅不一，像心跳的波纹。空窗有一种寂寞的意境，却也是另一种热闹，你能看见里面的院子、里面的花与树、里面的一小块天，多么美好。

什锦窗有圆的、方的，也有花卉、蔬果、扇形、几何图形的，我在一扇扇什锦窗前走过，每过一扇，窗框里的风景就换一个样——这扇框住一株月季，那扇框住一角飞檐，再下一扇框住一个正在喝茶的旅人。我忽然明白了，窗不只是窗，它是画框，是把流动的时光装裱起来的东西。

不只南京，不只杭州，也不只芜湖。安庆的倒扒狮老街，我定居了一年多才敢说懂它。它的徽韵是嵌在墙缝里的。比任何一座城的老街都酿着更浓的徽韵。这里的马头墙，便是老街最深情的注脚——墙面上刻着海子的诗行，“五岁的黎明，五岁的马，你面朝江水坐下”，墨色的字迹与黛瓦粉墙相融，让岁月的骨髓里，又浸满了诗意的温柔。

倒扒狮老街还给了我新旧交融、时空交错的梦。明清的屋檐与奶茶店的灯牌并肩而立，我穿行其间，像翻一册装订错乱的诗集——前一行是古徽州墨痕，后一行是现世的烟火，竟也押韵。街两边，老字号旁挨着服饰店、银楼、便利商店、咖啡馆、手摇，一家接一家，像不同时态的动词并置在同一个句子里，安静，却充满活力。我以为会吵，却没有。古典与繁华肩挨着肩，竟像多年故交，谁也不嫌谁。

我曾是个远行的人。从台北到南京，从南京到芜湖，从芜湖到杭州，从杭州到安庆，走到觉得自己的骨头里也长出了马头墙的棱角，血液里也流着黛瓦上淌过的雨水——走到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块会移动的墙砖，带着徽派建筑的基因。

老街知道这些。倒扒狮知道。那些石狮趴了三百年，屁股朝天，头却扭过来，笑嘻嘻地看着每一个过客，仿佛在说：你来了？你来了就好。你可知你要找的，不在别处，就在这里。

良辰，美景，赏心，乐事。谢灵运说四者难并，老街却轻轻巧巧地兜住了它们，像瓦檐兜住雨水，满了，便顺着滴水瓦一串一串地往下落——落到青石板上，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，那水花里藏着光，藏着影，藏着一个又一个旅人的足跡。

老街知道。它什么都知道。只是它不说。让马头墙替它说，让青石板替它说，让漏窗花窗空窗什锦窗替它说，像时间在说悄悄话，像老街用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，告诉我那些只有老街才知道的事。

